

先曾祖训导君先祖 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

先曾祖讳均，字安溥，自署治斋，生清乾隆中，家素给，承累世业绪，废居田畜，贲产至百万，入县学为增广生，援例得训导，教于海盐儒学。当是时，海内殷赈，吾家处余杭东乡，民朴务本。先曾祖虽多资，治家俭素，教子弟通经，戒华衣酒食及诸嗜好，而身为德乡里，出万余缗起苕南书院。又置田千亩，为章氏义庄。右为家塾，教族人读书。时宗族三百余人，贫者多就家塾习业，卒皆成就，为一方冠冕，嫗妇孤子有养焉。年六十四，清道光十二年卒。妣仲孺人，子男六人，先祖最少。

先祖讳鉴，自署晓湖，少从项先生梅侣习经算，稍长，入县学为附学生，援例得国子监生。丧亲时已三十矣，释服，与诸兄分处。然门户皆连构，无日不相过食饮也。性廉靖，不欲仕宦。自受学项先生，识诸耆旧，知百家学术。有奇羨辄以购书，蓄宋元明旧槧本至五千卷。日督子弟讲诵，自就春风草庐，讽咏其下。中岁好医术，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诸方书悉谙诵上口。以家富不受人餉糈，时时为贫者治疗，处方不过五六味，诸难病率旬日起。尝言药多则治不专，幸而中之，许胤宗所谓“落原野、张置罗以待雉兔也。”晚遭兵乱，转徙苕霅间，日在水次，犹数为穷民下药，赖以全者千数。年六十二，清同治二年卒。妣黄儒人，孙孺人，子男四人，先考其伯也。

先考讳潜，字轮香，少慧辩，自十五已好学。家多藏书，

得恣诵习。为文华妙清妍，尤善诗，以查慎行为法。年三十六，从先祖避兵。不持一钱，独取家谱藏之，时诸子独有兄箴方九岁，虽奔窜，不废督课。乱已定，家无余财，独田一顷在耳。素有风操，不肯游宦。用家贫游江南浙西诸县，尝客清杭州府知府谭钟麟所。钟麟迁河南按察使，直流寇起，从军佐莫府者皆有功。钟麟知先考才，欲与俱，以母老辞，故知府薛时雨教于敷文书院，见先考文辞，大爱之，欲令执轡、亦不往也。时东南民流转数岁，田荒，湘军退伍者率来开治，多占名焉，义庄田始千亩。乱定，占名财四百亩。先考以术钩问，知首尾圻鄂，卒尽得诸隐没者。晚岁里居，伯兄箴已成学，则亲课仲兄箴及炳麟读书。点窜文字，必躬亲之。始所治不过举业，先考时举藏书目录及平生师友学行以诒，诸子由是发愤为学。年六十六，清光绪十六年卒。妣陆孺人、朱孺人，子男四人，长殇。次箴嗣，清光绪戊子浙江乡试举人，嘉兴儒学训导。次箴，清光绪壬寅浙江乡试举人。次炳麟，民国东三省筹边使，授勋二位。

吾家当明之盛始迁余杭，族居东乡四五百祀，子姓朴谨、未尝有大过。先曾祖以下三世，尤以才行学谊称。先考尝以廩膳生援例得知县，治事过畴辈，而不乐仕。炳麟幼时闻先人余论，读书欲光复汉绩，先考亦不禁也。尝从容言：“吾家入清已八七世，歿皆用深衣敛。吾虽得职事官，未尝诣吏部。吾即死，不敢违家教，无加清时章服。”炳麟闻之、尤感动。及免丧，清政衰矣。始从事光复，遭累继，遇狙击、未尝敢挫。幸而有功，此皆先世遗教之所渐成也。寔定以来，执政者好妄举，靡岁不乱。炳麟以嫌疑寄帑海上，不得望先人丘墓，大惧旧德不宣，无以诒子孙为世法，故略次事状如此，未能尽什一云。民国八年二月。章炳麟记。

伯兄教谕君事略

君讳箴，初名炳森，字椿伯，先考轮香府君之元子也。年十岁，始通《论语》，遭太平军下浙江，尽室窜徙，三年乃得返。家贫，或劝为贾，先考难之。君亦不肯废书，习五经三年，皆上口。年十六，补余杭县学生，为知府茶陵谭君所知，文行渐著。年二十八，以廪膳生试优行高第，不得贡。凡八赴浙江乡试，始中式。时年三十七矣。三赴会试，皆不第。初以劳绩叙训导，既中式，改教谕，历署建德、浦江县学事。年四十七，选嘉兴府学训导，就管嘉兴中学校，当事甚重之。秩满，以贤能荐，当送部。君淡于荣利，又承祖训，州县吏多堕廉节，戒勿轻就，遂不赴。选充余杭教育会会长，兼主南湖局事。未几，选充浙江谘议局议员。清宣统三年，浙江光复，被推临时省议会议员，以病未就。民国元年，充余杭县议会议员。三年，县会解散。是时，君年六十三，老不欲与世事，杜门十余岁。年七十六，卒于家。时民国十七年一月也。

君自少至长老，不好弄，性俭，虽弊帖残纸未尝弃。与人和、对仆隶未尝大声色。晚病縻，杖而后行。然遇人迎送必如礼，及接大吏，亦如平人交。治事周慎，自仕宦至充代议士，事有不悉，不强言，然于乡邑利病持之至坚。尤习水利，其主南湖局也，谓将军塘袞坝为下游障遏、亟修之。某公司数欲于运河南渠间行轮船，君以南渠狭，两岸脆薄，轮船激水激之，必坏岸，集耆老力拒之。某公司百计关说不遂，则请出千金为质，备他日工振。耆老颇为动，君独不许，曰：

“破数千家田宅，千金足偿邪？且金有尽，而激水激岸无已时，虽巨亿不足以备不虞也。”卒请于官，刻石永禁焉。初，议塞九连池以固溪堤，会去不就。常自恨。民国初，君已家居，犹上巡按使书，请永禁侵垦南湖。且言修堤备水为治末，濬溪溶湖为治本，具论其法。虽不行，然自是侵垦者益稀。

充县教育局会长时，会员多树党相竞，君化以恬静，竞者自止。每乡人族党有大议，君至，为委曲陈说，归之正义。虽贪戾者皆厌服，时人以为难。少遭兵失学，兵事止，讽诵甚苦。弱冠从钱塘张繁父先生游，始知六书。年二十五，交仁和吴承志祈父，乃识儒先治经条例。以贫，数橐笔从长吏游，自恨不得壹意为学，然经史大体率皆明练。素不习算，年五十余，治勾股三角法，皆通。吾家三世皆知医，至君尤精。其所师，钱塘仲昴庭先生也。家居又宦游所至，有寡人子求治疾者，必应之，所全活甚众。然未尝以技自暴，惧为显要役也。

雅性方直。顾不甚窥宋明儒书。晚乃好王文成一家言，兼览释典，得其会通云。配孟氏，侧室李氏，皆不育。以弟箴之子恒年为嗣。炳麟少时尝问君行己之道，君曰：“圣贤难几也，士君子不敢不勉也。”识君之行六十年矣，接人恭敬而容不慙，处事中正而辞不厉，终身噩没而神不纷，虽古之笃行者无以加也。又其德施乡邑，于世宜有称，而君素不自矜伐，海内知君者犹寡，惧潜德隐曜，没而不章，故书其事略，存之家系，以为子孙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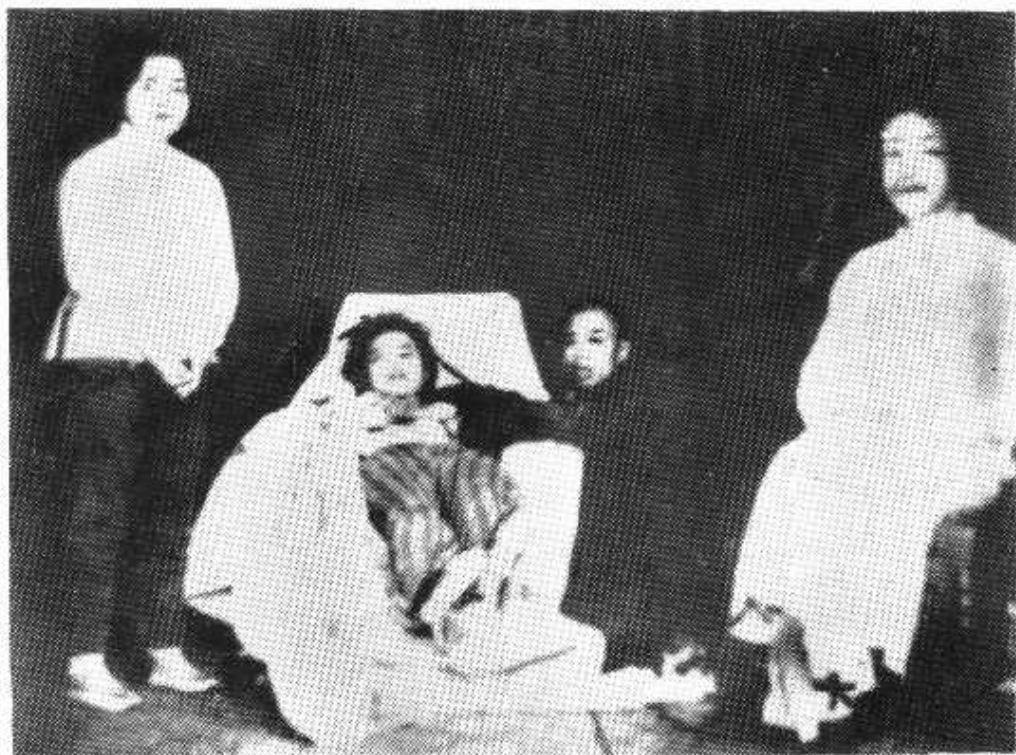
亡女姦事略

亡女姦，字蕴来，性端简，生十岁丧母。余适以事遭胡清逮捕，故姦从其伯父受学，三年。余违难抵日本东京，始通书存问，又四年，姦东行，余教之诗，不深好也。适嘉兴龚宝铨，年十七矣。宝铨素与会稽陶成章善，亦数离患。东走，从余学。故成章为致辞，既婚，未得归国，濡滞东京。岁余，武昌军兴，余始与宝铨、姦先后归上海，而成章解遭遇祸，宝铨不自聊，夫妇居钱唐西湖，无问世意。民国元年夏，复与宝铨同赴东京治疾，逾年归。

姦性狷好洁，平居衣履有小褻垢，必挈蹙刮治之，而恶与乘时取势者往来。然处家委顺，善得尊长欢，与叔妹居，无间言。独时邑邑不乐，常欲趣死。余数遇祸，而宝铨亦时怏郁。民国四年四月，姦如京师省视，言笑未有异也。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，余与季女珪常慰藉之。宝铨数引与观乐，或游履林园间，姦终不怡。见树色，益怏然若有亡者。九月七日夕，与宝铨、珪谈笑至乙夜，就寝，明旦起视，已自经，足趾未离地。解抚其匈，大气既绝矣。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，遂卒。

呜呼，余以不禄，出入生死几二十年，宝铨亦颠沛者数矣。幸虽有功，未得以觴酒与宾婚故人相劳，而衅咎复时中之。成章之死，与其他故旧无穷失据之状，皆姦所亲睹也。身处其间，若终身负疾疾者，其厌患人世则宜然。姦未死十日，余尝以苛养欲购石药。姦惧有故，辄止仆人毋往，其操心危厉如是，而遽自毁其躬。比敛，面如生，颜色更如欢笑

者，此曷为而然者邪？民国四年九月十一日，章炳麟书。



章太炎在长女章玆遗体前留影

附：节录汤国梨《章太炎先生家书》叙言

先生有女三人，长玆、次玆、次玆。丧母后，均依其伯父居。1910年，玆适加兴龚宝铨，宝铨字未生。1915年春，玆偕未生及妹玆入京省父，玆孝思颇笃，见其父之困蹶忧愤，乃极意承驩，饮食医药，无不周至。顾其心危虑深，居恒辄郁郁也！留五月，其姑驰书召归，玆既不忍远离父侧，又不欲重违姑意，自此益忧形于色！行有日矣，竟自缢于卧室，平旦发觉，已不救。噫，玆之死也，非袁氏杀之其谁邪！杀之而不血刃，何其酷邪！

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 事迹笔记

朱 希 祖

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希祖与张溥泉先生同在苏州，其夜会于锦帆路五十号本师章太炎先生宅，同问本师少年事迹，本师口授希祖笔记如左：

本师云：余十一二岁时，外祖朱左卿名有泉海盐人，授余读经，偶讲蒋氏《东华录》曾静案，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。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，外祖曰：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，尤以王氏之言为甚。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，惟南宋之亡，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。余曰：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。外祖曰：今不必作此论，若果李闯得明天下，闯虽不善，其子孙未必皆不善，惟今不必作此论耳。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于此。依外祖之言观之，可见种族革命思想，原在汉人心中，惟隐而不显耳。

十九二十岁时，得明季稗史十七种，排满思想始盛。

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，康有为设强学会，余时年二十八岁，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，俞曲园先生为山长。余始专治左氏传，至是闻康设会，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。

丙申二十九岁，梁启超设时务报社于上海，遣叶浩吾至杭州来请入社。问何以知余，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。

丁酉三十岁，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，因

问梁启超，孙逸仙何如人？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州政府，余心甚壮之。

戊戌三十一岁，康梁事败，长江一带通缉多人，余名亦在其内，乃避地台湾。

己亥三十二岁，自台湾渡日本，时梁启超设清议报于横滨，余于梁座上始得见孙中山，由梁介绍也。越二三月余回上海。

庚子三十三岁，因唐才常主张一面排满，一面勤王，既不承认满清政府，又称拥戴光绪皇帝，余甚非之，因宣言脱社，割辫与绝。但后唐案通缉书上，仍有余名。

辛丑三十四岁，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员，以避其锋，其年刻《虬书》于苏州。冬，恩铭后为徐锡麟所杀，为江苏巡抚问教士，汝校有章某否？此人因讲革命故须问之。余时因年假回杭州，教士急遣使杭州通知。

壬寅三十五岁，春即至上海，转至日本与秦力山交。时中山之名已盛，其寓处在横滨，余辈常自东京至横滨，中山亦常由横滨至东京，互相往来，革命之机渐熟。余与秦力山、张溥泉等开亡国纪念会于东京。中山请余至横滨，与兴中会同志七十余人宴集，每人敬余酒一杯，凡饮七十余杯而不觉醉。其年又回国。

癸卯三十六岁，蔡子民等在上海设爱国学社。张溥泉、邹蔚丹自日本归，章行严自南京来，相见甚欢，皆与余结为兄弟。时蔚丹作《革命军》，余为序而刻之。余又作《驳康有为书》，痛斥保皇之非。行严又主《苏报》社，亦发挥革命。《驳康有为书》中，有载恬小丑，不辨菽麦之语。于是清两江总督派员来查，遂成大狱，余与邹蔚丹被捕。余在巡捕房与中山书，尊称之为总统，溥泉为余送去，遂下狱三年。

甲辰三十七岁，在狱中。

乙巳三十八岁，蔚丹卒于狱中。

丙午三十九岁。夏，余监禁期满，中山自东京遣使来迎，遂赴东京入同盟会，主民报社。

希祖于丙午秋至日本，留学早稻田大学。乙未始与钱玄同、马幼渔、沈兼士、周豫才、周启明、许季黻等，受业于本师，常至民报社，别在大成学校，请本师讲授经子及音韵训诂之学，常至师寓，请益。故自丙午以后事，希祖颇谗知之。本日之问至丙午止。当时匆匆笔录，未暇修饰，别写一份，赠溥泉先生，归而笔于日记。今特录出，不增损一字，以存其真，聊供撰行述之参考。本师外祖左卿，为希祖族祖，今其家已衰落矣。海盐朱希祖记。

仓前人的儿子一章太炎

章 念 驰

在美丽的西子湖畔，在南屏山荔枝峰北麓的古柏苍松怀抱之中，坐落了一座小小的古朴的陵墓，里面安息着一位中国近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——章太炎，周恩来总理曾称他为“浙江人的骄傲”。

章太炎(1869、1、12——1936、6、14)，名炳麟，他因为崇敬民族文化大师顾亭林(号炎武)和黄宗羲(号太冲)的学问与气节，取号太炎，人皆尊称他为太炎先生。章太炎出生在杭州郊外余杭县的仓前镇——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。他降生的年代，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和变化奇瑰的岁月，旧时代在衰亡，新时代在崛起，他和康有为、严复、孙中山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一样，都是这个时代的披荆斩棘者。

章太炎自幼聪慧勤奋，他在投身社会革命洪流之前，在他父兄和外祖父的严格教育下，刻苦研究了汉字，后又师事俞樾大师，对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献作了悉心钻研，成为了一个博学的年青学者。他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，又贪婪地阅读了当时传入中国的一切西方典籍，从中探索义理。但是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相继失败，使他对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希望破灭了。时代的风暴撞击着他书斋的窗户。内忧外患的痛苦现状冲击着他的心扉，他从中国诸子学和西方人文学的义理中，汲取了激进的内核，终于摒弃了书斋，冲向了社会。

在他投身救亡洪流的初期，他曾是一个维新改良派的信

徒，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，使他认识到要救亡必须革命，他决心以一介书生推翻二千年的帝制，于是他公然与清政府挑战，并第一个向保皇派展开论战。他的激进思想和锐不可挡的文字，以致“七被追捕、三入牢狱”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震惊中外的“苏报案”，使他几乎丧生，但他毫不屈服，成为革命者所崇拜的偶像。他与蔡元培共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，他与孙中山、黄兴等共创资产阶级第一个政党同盟会，并任革命机关报《民报》主笔。他作为封建文化中脱胎出来的战将，其反戈一击，分外有力，他那以国粹激动种性，用宗教发起信心，促进国民道德的论说，真是所向披靡，牵动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心，为辛亥革命胜利作了舆论准备。

他为革命，三次流亡日本，在那里他组织了“亚洲和亲会”，这是亚洲第一个反帝同盟。在那里他进一步研究了西方进步学说，把《斯宾塞文集》、《社会学》、《希腊文学史》等介绍到中国，他一边从事革命，一边进行讲学，培养了许多人才，近代中国许多新旧文化运动的创导者，如鲁迅、钱玄同、黄季刚、刘师培、陈独秀、胡适……都出于他的门下，或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。

辛亥革命胜利后，他为捍卫共和，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，而投入“二次革命”，只身赴京，以大勋章为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，被幽囚三年。袁世凯死后，他又与孙中山先生一起组织“护法运动”，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，经年奔波，却无法使现实好转和阻止军阀的混战。失望使他徬徨，徬徨使他消极，消极使他逐离民众，渐入颓唐，变得落伍。当抗日运动爆发，他不顾年迈，翕然而起，风尘仆仆，奔走抗日，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和爱国者的晚节。

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，虽然没

有看到革命的最后胜利，但他力主变革，为古老的中华民族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总潮流，使之早日立于世界列强之林，为这厚厚的冰河打开第一道裂口，贡献了毕生精力，他作为一个学者，有着宏富的著述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，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产。

他在学术史上是一位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巨匠，也是一个自成一宗的巨人，在世界文化史上，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，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他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他是被公认的国学大师，在语言文学方面，上探语源，下辨流变，从语音入手探析形、义，揭示汉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和规律，为中国文字创造了一套简便的注音符号，在中国沿用了几十年之久；对汉语言文字的革新和发展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，写下了不少富有创见的学述著作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。

其次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方面，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代的经学大师，为二千年来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作了体面的结局；他把神秘的经学，用史学的观点来说明，提倡六经皆史之说；把神化为大圣的孔子，降到凡人——一个教育家史学家的地位，恢复了经学的本来面貌。他力图把古老的经学研究，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，以现代观点重新解释，作了成功的尝试。

在史学研究方面，他更有筚路蓝缕之功。他把史学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源泉，他说“一国文化，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”。他对中国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的发展，作了系统的研究，特别在先秦诸子学研究方面，造诣极深。他力图以

进化论和社会学的观点，去解释历代文献，并提倡求是致用，反对任意曲解和臆造历史。

在哲学上，正如侯外庐先生所称，他“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，揉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，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”，“他对于极大极微的宇宙、人生、社会问题，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”；又如贺麟先生称他是“当时革命党唯一的哲学代言人”。他的哲学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精华，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提供了一种新的异常宏富的世界观。

在文学上，他提倡文学革命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靡丽文风。他以文笔为武器，进行“令人神旺”的斗争，留下了许多革命的战斗的文章，成了他最永久的业绩。他推崇魏晋文风，并竭力追慕，使他的文章重气重质，内容充实，感情丰富，笔力雄健，充满阳刚。在诗歌方面，他提倡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，主张抒发真情，反映现实。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，他反对生搬硬套，反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民族虚无主义。他在近代文学史上是开倡了一代新风的代表。

章太炎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还包括医学、佛学等等方面，他这些贡献和建树，为人类文明的宝库增添了一份丰盛财富。

章太炎和其它历史人物一样，他不是一个完人，而且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。他在时代的局限下，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，使他从事的革命夭折了，他堕入了悲哀和失望之中，变得迟钝和落伍。他致力文化事业，由于他思想上的两重性和哲学上的相对主义，以及他所负的沉重传统文化的包袱，加上他那晦涩难懂的文字，充满典故的文章，还有他那桀敖不驯的个性，形成了一朵与时代和人民大众相

隔绝的墙。他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，没有获得当时人们对他的了解，这是时代的悲剧。但是，他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，是值得世代借鉴的。

章太炎的一生，足资证明他是浙江人的骄傲，他无愧为仓前人的儿子。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纪念祖父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

章 念 祖

祖父早年奔走革命，五十岁始得子。在去世前，知将有孙辈，很是高兴，但疾病突发，终究没有见到孙儿。之后不久，我出生了，遂取名“念祖”，其意不言自明。于是，我从小就听得长辈说了不少关于祖父的事，特别有深刻印象的是祖父的勤奋好学、俭朴和平易近人、诲人不倦。

一

祖父是一个爱国者，这在许多文章中有了介绍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每逢外敌入侵，国家存亡危急的严峻时刻，总是不顾个人安危，挺身而出。然而，爱国的涵义也绝不止是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，表现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，而更多地是表现在他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如何竭尽全力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，向一切阻碍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集团或势力作不懈的斗争。“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”，显示出革命志士的英雄气概；另一方面他坚韧不拔地钻研学问，在哲学、史学、文字音韵、医学、佛学、金石考古、诗词文学等方面都有着精湛的研究和创见，达到了新的水平，在提高民族文化和发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，是他获得学术上这些成就过程中的勤奋和刻苦，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了一个爱国者的高贵品质。

关于祖父的认真读书和好学不倦，听父亲说起下面一些事(父亲是听他大伯母说的)：

祖父幼时在家，曾祖母若有闲便与女眷戚玩雀牌消遣。

当时，照明用的是小油灯，在牌桌角上放上盏油灯，而祖父就坐在桌子旁，就着灯火看书。尽管有时比较喧闹，但祖父看书却从不受到影响，总是专心致志，旁若无人。

祖父经常和兄嫂生活在一起，大伯父炳森和大伯母孟夫人都长祖父十六岁，大伯父和大伯母1872年结婚，当时祖父仅四岁，年龄上差得比较多，“长兄若父，长嫂若母”，所以大伯母对祖父很关心。一次，祖父在房前天井里看书，天色渐暗，天气也转凉了。大伯母就叫祖父进屋去穿件衣服，免得着凉了。祖父听得后，就进屋拿了件衣服穿上继续回到天井里就着余光看书。殊不知进屋拿了穿上的是大伯母的一件花马甲，大家见了直发笑，而他自己却还不知道是穿错了衣服。

祖父自小专于学业，不谙嬉耍。祖父告诉父亲，说自己不会嬉耍，而只会玩“升官图”（这“升官图”是一张图，其上从平民百姓起，按官阶、官职逐级排列，其间填入有奖惩之类的名目，供多人一起玩。用一颗骰子轮流掷，按骰子点数顺序前进，过程中有进有退，有奖有罚，以先到终点或领先者为胜，有如目前“飞行棋”“运动棋”之类的游戏）。父亲七、八岁时，祖父就教父亲玩“升官图”。祖父说，他自小玩“升官图”倒不在于消遣，而是从中可学到不少东西。如清朝的人事制度、机构编制、官阶升迁和赏罚，又譬如说，捐监是怎么回事，捐生不能做宰相等等，都是自小从“升官图”中了解到后再深入搞清楚的。过年时节还有兴致和我父亲、叔叔一起玩。

总之，从这些细微之处可以看出祖父对学问的专心，从不为其他琐事或环境所干扰。即使是玩耍，也寓学习于娱乐之中。在三十岁之前，他几乎主要就是读书。非但研究中国文化，还在一些著述中反映出对西方当时的自然科学也注意

吸收掌握。到四十多岁时，又学习梵文以进一步研究佛经。他学术上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勤奋和刻苦。这种精神是不能忘怀的，它鼓励我们为祖国努力地学习。

二

祖父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，看到有些文章中谈到在“护法运动”过程中，为联络唐继尧，祖父去川、滇、黔，一路上，大炮台香烟不离口，白兰地酒不离桌，给人一个似乎很会吃喝享受的印象。他抽烟喝酒是有的，但听祖母说，祖父很不讲究。抽烟很多，但不看什么牌子的，有烟抽就可以。他确也喜欢喝酒，你只要给他斟上，他就喝下，不斟也就止住了，大家一劝酒，他就会不住地喝，直到醉倒，至于什么酒也是无所谓。早年亡命在外，有一餐无一餐都不计较，有时“吃过”“没吃过”也记不清。祖父对父亲说，在日本有“盐笃饭”吃已是不错了（所谓“盐笃饭”是用筷蘸着盐下饭）。有时没有经费了，东借西凑，买一些米，几颗蚕豆也可以下饭。晚年在苏州，生活相对要稳定多了，条件也不错，每餐也有好几个菜，但吃饭时，旁人如不为他挟菜，他总是往最近身旁的菜中下箸，摆上什么就吃什么，吃得很快，甘苦不论。这固然和祖父患有鼻炎，又是高度近视有关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革命志士以天下为己任，追求的不是生活享受。所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，如穿衣着鞋也十分随便，也不讲究。在日本时，衣很脏很破旧，也不去多费心。与祖母结婚时，已是辛亥革命后，才第一次穿皮鞋，以致闹出了左右两只鞋搞错了的笑话。这种专心于事业，致力于国家而不追求生活享受的精神风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